

李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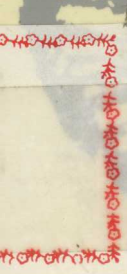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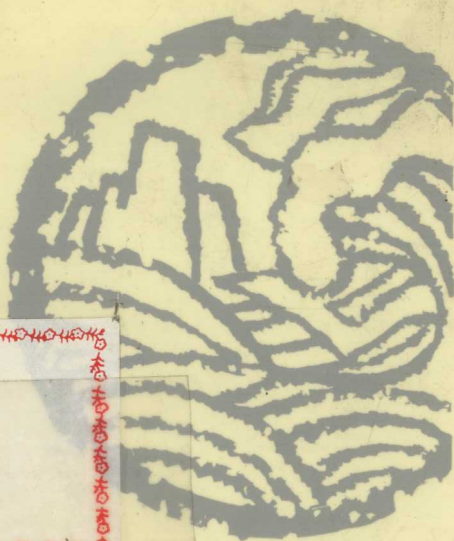
刘镇伟

选注

甲午战争诗歌选注

戚其章题

824



甲午战争诗歌选注

李生辉 刘镇伟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4 • 1

[辽] 新登字 15 号

甲午战争诗歌选注

李生辉
刘镇伟 选注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字数：33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
印数：1—2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绪蒲 版式设计：马 壮
封面设计：隋其增 责任校对：王恒田

ISBN 7-80612-039-4/I·11

定价：11.50 元

序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大败于平壤，继而日本侵略军占旅顺、陷威海，迫使清王朝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产生在这苦难时代的诗歌，虽然在艺术上不能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但是在内容上强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强烈斥责清王朝腐败无能、强烈要求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却十分感人。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人注意及此。现在李生辉、刘镇伟两先生经多年努力完成的这本《甲午战争诗歌选注》，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同时也为近代诗歌史的研究铺了一段路，为进行爱国教育提供了一本教材。他们的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中华民族是诗的民族，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浩如烟海，像《全唐诗》、《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等虽然有错误和缺漏，但不失为一代诗歌的总汇，给选唐诗、唐五代词、宋词、金元词者以极大的便利。选甲午战争诗歌的人就没有这个便利。孔广德的《普天忠愤集》、连横的《台湾诗乘》、阿英的《甲午战争文学集》存录佳作不少，但受编辑要求及当时条件制约，其收录范围亦有待扩大。因此李生辉、刘镇伟两先生在选甲午战争诗歌时，除了注意上述三书外，还注意去翻查清末民初有关总集、别集以至笔记、方志、报刊等等。因此，这本《甲午战争诗歌选注》虽然选诗仅一百五十余首，但半数以上的诗都是新发掘的，这也是他们的功绩，也是应该肯定的。

在同一历史环境里产生的诗歌，甚至是歌咏同一事物的诗歌，由于作者不同，他们所反映的现实和所抒发的情怀也往往不同。李生辉、刘镇伟两先生在选甲午战争诗歌时，牢牢地掌握住选反映了历史真实、艺术水平又高的名家名作，如黄遵宪的《悲平壤》、《哀旅顺》、《台湾行》，丘逢甲的《离台诗》、《春愁》、《往事》、《秋怀》，叶衍兰的《菩萨蛮·甲午感事与节庵同作》，王鹏运的

《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滴戍军台》、文廷式的《广谪仙怨》(玄菟千里烽烟)、梁启超的《水调歌头》(拍碎双玉斗)等。其次,对于一些亲身经历甲午战争血与火生活的人,虽然他们不是诗人,或者不是著名诗人,但他们的诗洋溢着炽热的爱国之情,例如房毓琛的《牙山曲》、张之汉的《閤生笔歌》、许荫亭的《感怀》、佩珊女史的《感咏》等等,即使艺术上稍嫌粗糙,也酌情作了选录。虽然是名家,但他们的作品离甲午战争较远,不选;虽然是写甲午战争,但思想内容不健康,或者艺术性太差的,也不选。这是本书的取舍标准。这个标准无疑是恰当的。

《甲午战争诗歌选注》的作者介绍和每首诗的题解都简明扼要,实事求是。有的长诗,题解只有近百字左右即将诗的写作时间及诗的内容交代清楚了。而有的绝句诗,如孙宝田的《题旅顺万忠墓》仅仅二十八个字,而解题引《辽海赘翁回忆录》(手抄本)用了五百字左右,交代万忠墓的来历,对该这首诗大有帮助,并不使人有累赘之感。

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受了“新诗”的影响,例如黄遵宪自己就曾提出过“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的见解;另一方面,受“宋诗运动”演变而来的“同光体”的影响更深。同光诗人认为:“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能喜语也。”(陈衍《石遗室诗话》)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诗人要有学向,做诗要用典故,语句要新奇,只有这样的诗才是好诗。加之,甲午战争诗歌的史事性又极强。这无疑都会给广大读者造成不小的困难。因此,李生辉、刘镇伟两先生的《甲午战争诗歌选注》不但在诗词的发掘、取舍上,作者介绍、解题上,花了不少的精力,在注释上下的功夫更多。本书的注释详细、可信,有的还补充或纠正了前人注释的不足或错误。例如黄遵宪《哭威海》诗:“麾海军,急上台。雷轰轰,化为灰。山号跳,海惊猜。击者谁,我实来。”钱仲联先生的《人境庐诗草笺注》未注,而本书注者则引《清末海军史料·池仲祐《甲午战事记》》作注,指明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指挥部下炸毁北帮炮台事。又如叶衍兰《菩萨蛮·甲午感事与节庵同作》第六首下片:“乘槎空挂席,朱采支机石。”本书注者除详细注明“乘槎”与“支机石”的出典外,还指出:“此指张荫桓、邵友濂东渡使日。

张、邵一行，1895年1月26日乘英轮‘王后’号从上海出发，28日抵长崎，31日至广岛。‘未取支机石’，言张、邵二使使日无成。按张、邵至广岛后，日方以‘全权不足’为由，拒绝开议。张、邵遂被逐至长崎，2月12日离长崎回国。故谓张、邵之行乃‘空挂席’。再如郑观应《闻大东沟战事感作》中的：“梁宏立志果不虚，生当封侯死庙食。”有的选注本只注“梁宏”，致使此两句诗意不可解。本书注者引《后汉书·梁竦传》：“（竦）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作注，不但注明了出典，使诗意清楚，而且说明“宏”乃“竦”之误。（当然还应该查版本）。

写这样“有书为证”的注释，表面看来不过是一字一句的解释而已。但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时为了一个词语的解说、一个出典的查找，真是要花九牛二虎的力气才得解决问题。因此，尽管本书的注释，甚至包括前言、选材、作者介绍、解题等，容或有待商量之处，但李、刘两先生这种孜孜不倦，务求完善的认真负责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1991至1992年间，李生辉先生来华东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甲午战争诗歌。因此，我有幸最初读到这些稿子。李生辉先生为人诚笃、治学严谨、学植深厚；刘镇伟先生（现任大连图书馆馆长）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文学史教学工作，并对甲午战争史作过深入研究，文史两方面都颇有造诣。他们合著的《甲午战争诗歌选注》的开创先路、详征博引，论文的观点独具、论证严密，都给了我颇为深刻的印象。

甲午战争过去整整一百年了，这血泪斑斑的历史，中国人民永远是不会忘记的，也永远不会让它重演。李生辉、刘镇伟两先生的《甲午战争诗歌选注》在这时出版正说明了这一点，它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和爱好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预期的。

夜雨孤灯，遵嘱为序，文成抚卷，神驰不已。黄浦江畔或鸭绿江滨重聚论文，定将有胜于曩者，但不知何时矣。

马兴荣

1993年11月11日

于上海忆庐沪斋

序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了。一百年前的这场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产物;是对中国的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打败了落后的中国,并强迫清政府缔结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它刺激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胃口,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把中国社会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然而,“战争是消毒剂”(毛泽东语)。甲午战争的强烈震撼,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客观上激发了中华民族新的觉醒。当民族灾难的阴霾笼罩神州大地之际,首先受到震惊而觉醒的是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其中主要是关心民族命运的爱国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之中,有的投笔从戎,慷慨赴国难,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血洒疆场,莅弘化碧;有的上书言事,抨击时弊,为反对外来侵略,保卫国家而献计献策;更多的人则以文学为武器,诗歌作投枪。他们满腔义愤地痛斥日本的侵略暴行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满怀激情地讴歌杀敌报国的将士;大声疾呼,唤起民族的觉醒与奋起,从而形成了鸦片战争以来震聋发聩的爱国诗潮,谱写了中国近代诗歌史上不朽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遗憾的是,这份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百年来却整理研究乏人。早些年,阿英编辑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由于收辑的内容广泛,诗歌仅占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反映甲午战争诗歌的全貌。至于其他人偶有论及者,亦属凤毛麟角,且失于全面而欠深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出现了空前

繁荣景象。近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但对甲午战争诗歌的整理研究,却仍因问津乏人而成为空白。

可喜的是,李生辉、刘镇伟两位先生经过多年的罗掘蒐求,艰苦努力,于最近编撰完成了《甲午战争诗歌选注》一书。书中精选了近代四十位诗人所写的,反映甲午战争的一百五十余首诗歌(包括词),并对每首诗歌(词)都做了认真的辑佚、校勘和详细的作者介绍、题解及注释。这一百五十余首甲午战争诗歌的精品,构成了一部绚丽的诗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甲午战争的全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甲午战争诗歌选注》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诗歌汇编。它的出版不仅填补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空白,也提供了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整理、笺注古典著作,是一项高水平但又是很艰苦的学术工作。没有渊博的学识,过硬的文学、文字功底和坚实的科研功力,难以胜任。尤其象《甲午战争诗歌选注》这样一部为四十名诗人、一百五十余篇诗作进行辑佚、校勘、注释的大型著作,难度就更大了。除了编者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精通古典诗词外,还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熟悉原诗词作者的身世、写作的历史背景以及诗词中的用典、隐寓等等。非此则难以对内容广泛、典事繁多、寓意隐晦的甲午战争诗歌,做出全面、准确的整理、笺注工作。

通读《甲午战争诗歌选注》之后,觉得这部书的选注工作,基本上做到了“信”、“达”、“雅”三个字。这部选注不仅在辑佚、校勘、注释等环节,做到了信而有征,踏实准确,文字方面也写得通达优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部在现代人看来文字艰涩、用典深奥的古典诗集,通过注释,竟成了人人可以读懂的雅俗共赏的文学读物,这充分反映了编者学识之渊博和科研功力之坚实。

关于收录在这部选注中的甲午战争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体制特点、表现手法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承启关系和历史地位等等,在本书的代前言——《甲午战争诗歌综论》中,已经做了全面、系统和公允的分析论述,读了它,自会对甲午战争诗歌有更深层的理解。我虽然对甲午战争史曾做过一些粗浅的探讨,但由于不谙古典诗词,文学根底又很浅薄,对甲午战争诗歌的评价,自无置喙的余地。但诗歌所反映的甲午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屈辱与灾

难；诗歌所表达的诗人们于危难之中呼唤民族觉醒与奋起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强烈地感染了我而深受启发和教育。历史告诫人们：落后就要挨打。一个贫困落后的民族，永远摆脱不了被欺凌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不可能领导人民走向独立富强。先辈们炽烈的爱国热情和悲壮的呼号，在那个时代，最终只能化作历史的遗愿。

庆幸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为独立富强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经过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奴役与压迫，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应该忘记近百年民族屈辱的历史，从创钜痛深的教训中，了解今天的新中国来之不易，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充分珍惜和热爱今天，愤发图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相信，欣赏过这部《甲午战争诗歌选注》的广大读者，也定会有此同感。

最后，当这部凝聚编者心血的力作即将付梓面世之际，谨对编者在学术研究上锲而不舍，严肃认真，甘坐冷板凳的刻苦精神，深表赞赏与钦佩；对编者在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做出的可贵贡献，表示衷心的祝贺！

孙克复

1994年1月于沈阳

甲午战争诗歌综论

(代前言)

甲午战争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在晚清诗坛上,继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之后,出现了又一次爱国诗潮。此次爱国诗潮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直接冲击下产生的。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本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然而却以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战争一面以诱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加速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沉沦的过程;一面则以空前的危机震撼中华民族,使之进入新的觉醒阶段。当灾难降临中华大地之际,诗人们面对急速恶化的时局,不囿于艺术见解的歧异,而在拯救中华民族这一根本点上取得共识,以强烈的义愤全面地揭露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于失败之中讴歌压倒敌人而不会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于危殆之中呼唤民族的觉醒与奋起,遂汇而为新的爱国诗潮。甲午爱国诗潮再现了风云变幻的时代,磨愤交织而不掩民族正气,从而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谱写下感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甲午战争诗歌(包括词),散见于晚清及民初诸家别集(其中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房毓琛《隅梦草堂诗草》和洪弃生《寄鹤斋诗集》佳作尤多),其辑录成集者有孔广德《普天忠愤集》(卷十一、十二)、连横《台湾诗乘》(卷六)、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卷一)等,陈衍《近代诗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及叶恭绰《全清词钞》亦有收录。这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然而整理与研究甚少,偶有论及者亦失于全面考察而有待深入。本文拟对甲午战争诗歌略作综合性论述,以就正于方家且期引玉。

甲午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而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王朝,既束缚民族伟力于未战之前,复出卖民族利益于既败之后,战则无以御敌卫国,和则适足割地弃民。故而以强烈的义愤全面地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无能便成为甲午战争诗歌的重要内容。

甲午战争诗歌对清王朝的揭露,并非如论者所云仅限于鞭挞“庸臣误国,败将畏敌”。鞭挞庸臣败将,为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反侵略战争诗歌共有的内容。以鸦片战争而论,当时清王朝尚维持表面的“全盛”,加之诗人们亦囿于传统的华夷观念,视资本主义英国之于清王朝犹沧海之稊米,故多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臣庸、将懦。而甲午战争时则不然,时清王朝已臻难以为继地步,从最高统治者至其中枢机构,从作为统治支柱的陆海两军至其赖以行使统治的庞大官僚体系,莫不于此战中暴露出衰朽的本质。故而甲午战争诗歌对清王朝的揭露达到前此所无的广度与深度。其基本特点是集中抨击身兼将相的李鸿章,上而直指慈禧太后,广而及于封建国家机器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

李鸿章控制着清王朝军事与外交大权,在甲午战争中起着影响全局的作用,故而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李鸿章昧于世界大势,幻想依赖列强调停制止日本侵略,于“起衅之初,未尝准备”,及至战,又消极防守,以致“著著落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三〇〇二]》)。故房毓聚于《杂感》其九中以“救患须先策,防谋敢后时”之句反语相讥,叶衍兰《菩萨蛮·甲午感事》词其五亦有“烽火已漫天,何时著祖鞭”之叹。由于李鸿章的迁延贻误,陆军既败于成欢,复溃于平壤,遂“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过鸭绿水”(黄遵宪《悲平壤》);海军亦于大东沟之役后,龟缩威海卫,“从此华舰匿不出”(黄遵宪《东沟行》),终致全军覆没。清军水陆交绥后,李鸿章秉承清廷“社稷为重,边徼为轻”(《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二九八四]》)的意旨,厚颜赴日,屈膝乞和。故而张罗澄于《感事》诗其二中就其遇刺事挖苦道:“漫怪相公颜独厚,创深痛巨苦寻盟!”李鸿章所

议定的《马关条约》遭到举国反对,光绪帝命其“详筹挽回万一之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三〇四二]》),而李鸿章则以“改约电议,适速其决裂兴兵”(《同上书[三〇五七]》)相威胁。房毓琛《仁川行》谓其“坚持和议撼朝廷”,即指此事。李鸿章的投降外交,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故陈玉树《乙未夏拟李义山〈感有感〉》其一:“高阁格天资敌国,千秋青史竟如何?”房毓琛《秋夜感怀》其六:“六国和成金布地,千秋论定铁模人!”两诗皆径斥其为秦桧。

不过,李鸿章还是一个前台人物,其后台则是慈禧太后。故而甲午战争诗歌锋芒所及,直指慈禧。慈禧及其卵翼下的后党人物,庸腐冗阔而又实际控制着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故梁鼎芬《菩萨蛮·和南雪丈甲午感事》词有“西头势重”和“纤儿奈汝何”之叹。慈禧平时骄奢,“惟以听戏纵为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终日沉湎于“琅璫钿瑟”之声、“素娥青女”之色(引语见叶衍兰《菩萨蛮》其二),甚至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致使北洋舰队成军后舰船、枪炮皆无法更新。叶衍兰《菩萨蛮》其十“长城吾自坏,移筑蠡螭塞”,即指此事。及至甲午战争期间,慈禧根本不把战事放在心上,旅顺口危殆之日,正是她盛张瑶池宴之时,“鲸鱼决荡蓬莱震,犹是衔卮半信疑”(朱克柔《拟白香山新乐府·昆仑》)。当战局发展危及其统治时,则贬斥主战官员,并挟制光绪,使之“不敢专出埽”(向上),随即遣使议和,不惜割地赔款以换取苟安。梁鼎芬词有“繁声香旖旎,天也胡为醉”(《菩萨蛮》其四)之语,丘逢甲诗有“鹑维剪后天方醉,无路排云叫九阍”(《有书时事者为赞其卷端》其一)之句,皆以天帝借指慈禧,责其昏聩、腐败,竟至割让疆土。

甲午战争诗歌在集中抨击李鸿章的同时,还广及海、陆两军和各级官吏。就海军而言,李鸿章耗帑巨万而编练的北洋舰队,除在大东沟海战略显身手外,竟坐毙于威海。故杨文萃《书感》诗中怒斥道:“误国群奸真是贼,筹边六舰竟降倭!”就陆军而言,被李鸿章诳之为“劲旅”的淮军,开战以来接连败北,而其统将叶志超犹“急避天骄夸上策,虚传露布诳中朝”(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继淮军投入战场的湘军,久攻海城不下,及至牛庄之役,其统帅吴大澂竟闻风逃遁,故而陈玉树讥刺道:“一战顿教粮械尽,也应无面返湘州。”(《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时清军中,将则“未闻御敌策,犹作富家谋”(房毓琛

《杂感》其十八),卒则“危语几空野,阴谋险劫城”(房毓琛《杂感》其二),遂造成“战垒沿山弃,城门流水开”(房毓琛《杂感》其一)的局面。随着清军在战场上的溃败,清王朝在战区的统治机构也迅速瓦解。日军侵入辽东半岛以后,盛京地区旗、民两系之官纷纷弃城。其旗系之官,坐致尊宠,“人爵荣开府,天恩贵拥城”,而敌人未至,即“苍皇悲出走,相对泣哭声”(房毓琛《杂感》其十一);其民系之官,颇多捐纳得官者,故亦“大都非战罪,先已挈家行”(房毓琛《杂感》其十)。九连城陷后,省垣震动,“文官面如土,武官身不昂。小车载妇女,大车载橐囊。此城不可守,疾走归四方”(房毓琛《九连歌》)。割台消息传出后,同样的丑剧亦在台湾演出:“前车载囊橐,后车载妻孥……江山方鼎沸,官府争首途。国事彼何知,鼠窜保头颅”(洪弃生《台湾官府纪事》)。中下级官吏如此,那些封疆大吏如何呢?其庸碌者如江西巡抚德馨,于“辽沈遍烽烟”之时,犹“广求钟乳三千两,远聘梨园十万钱”而“独乐”(陈玉树《甲午拟李义山〈重有感〉》其九);其干练而颇负时望者如山东巡抚李秉衡,竟惑于敌人声东击西之计,而坐视北洋舰队覆没,故黄遵宪于《哭威海》一诗中讥其形同昏睡。至于京朝官,则非“三旨相公”,即“十钱主簿”,北京城里“紫标黄榜多豪富,府海官山少异才”(陈玉树《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其九)),亦罕有堪任国事者。

总之,甲午战争诗歌从多种角度和不同侧面,把腐败的清王朝暴露无遗,既揭示了其背叛民族而仰息帝国主义的面目,也指出了其大厦将倾的必然趋势。在揭露清王朝的诗篇中,固然有囿于君德之明昏、臣节之忠奸以及兵将之勇怯者,而多数则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故而诵读之下每令人感到有强烈的民族义愤之情流注于字里行间。

二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外则面对凶顽的侵略者,内则受制于腐败的清王朝。然而爱国将士喋血鏖战于沙场,主战官员披肝沥胆于朝廷,义民义军前仆后继于疆土既蹙之后,无不表现出压倒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故而热情地讴歌爱国军民,

便成为甲午战争诗歌又一重要内容。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屡遭失败。而其爱国官兵则未尝屈挠其志,每于劣势已成,甚至败局已定之际,犹表现出压倒敌人的气概。他们或血洒疆场,壮烈殉国(如陆军之左宝贵、永山,海军之邓世昌、林永升);或以弱御强,奋勇搏战(如马金叙、聂士城、徐邦道、孙万龄);或被围绝援,宁死不降(如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其中左宝贵、邓世昌屡为诗人讴歌。左宝贵于牡丹台陷后,“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黄马褂登城指挥”(《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手发榴弹巨炮”(《沈阳县志·人物》)而战死。诗人王春瀛感其事,于《甲午三忠诗》中歌道:“奋臂生吞虏,捐躯死策勋。”邓世昌于致远号重伤后,“志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于是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中东战纪本末·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其猛鸷气象令敌人胆慑,使观战之列强军人“啧啧称羨”(同上书),及落水后,“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一七三八]》)而自沉。王春瀛既感其“怒沉舟”之概,复壮其节,于同诗中叹道:“杀敌留馥恨,孤生亦足羞。”李光久、魏光燾两部湘军面对两倍于己之敌,毫无畏惧之态,血战而后失牛庄,阵亡将士达一千八百餘众,敌虽得牛庄亦不得不承认“战颇苦”(《日清战争实纪·牛庄的陷落》)。故房毓琛《杂感》其四赞道:“辛苦湘营士,犹能死战场!”东征帮办宋庆“无调度,非大将材”(《东方兵事纪略·奉东篇》),然而他以七十五岁高龄转战辽东,日军亦折服其毅军于战斗中“不轻露屈挠之色”(《日清战争实纪·缸瓦寨之战》)。故陈玉树赞其“不随河上共逍遥”(《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其三),潘飞声赞其“老黑当道遏奔狼”(《秋感》其五)。帮办台湾军务刘永福于唐景崧内渡后,团结军民,坚持抗战,屡创日军。诗人曹润堂闻捷狂喜,作诗歌颂道:“孤身撑日月,只手挽波澜。气共山河壮,威加虎豹寒。”(《露布传来夜不能寐因作小诗以志狂喜》)

甲午战争期间,在战场上两军交战的同时,清廷内部帝后两党、和战两派也展开尖锐斗争。战争之初,慈禧、李鸿章等即心存和局,及至战事每况愈下,则乞和益切,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苟安。帝党官员志锐、安维峻、文廷式等不畏慈禧的淫威,连篇累牍地上奏疏,一则筹画战守之策以挽救败局,一则揭露主和派以制止投降阴谋。梁鼎芬《菩萨蛮》词其七:“缥缈鸾凤扶云

下,绿章次第通宵写。不敢负深恩,身危舌尚存。”即歌赞主战派官员身处危境,犹谏诤不止。后志锐等相继被逐出朝,时人多以诗词相赠,谴责主和派而歌赞主战派。旅顺口陷后,光绪帝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而予以褫职留任处分,慈禧随即降瑾、珍二妃以报负,并趁机谪志锐(二妃之兄)于乌里雅苏台。王鹏运《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词为志锐于辽东“莽莽烽烟”之际而被谪深致不平。词中有“尽雄虺琐琐,呵壁问苍天”语,怨愤直指慈禧。后安维峻疏劾李鸿章,谓其“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光绪朝东华录·二十年十二月》),并且词连慈禧,慈禧于盛怒之下,迫使光绪帝将其革职,发戍军台。王鹏运于《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词中则盛赞其为“真御史,奇男子”,并以自责而表敬意:“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马关议起,文廷式一再陈谏,极言不可从,有“辱国病民,莫此为甚”,又有“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之语。慈禧遂“欲重谴”,李鸿章亦“欲中以奇祸”,文廷式乃“乞假南归”(据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时王鹏运以《木兰花慢》词相送,后黄遵宪亦以《贺新郎》词相慰。王词有“看风雨纵横,江湖溟洞,车骑纷纭”语,黄词有“一片平芜飞絮乱,无复寻春试马。又渐渐、夕阳西下”句,皆寓托国事不堪之忧愤,已见爱国士大夫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故王词以“君门,回头万里,料不应长住恋鲈莼”语,规劝文廷式暂归后即返回朝廷;黄词以“相约须臾毋死去,尽丁歌甲舞今霄且。看招展,花枝惹”句,于激愤与无奈中,亦寄托望其东山再起之意。两词情调低抑,犹含不屈之志。《马关条约》签订后,不禁京朝官之封章、疆臣之电奏凡百十上,而且资产阶级维新派亦发动会试公车上书,遂使反对和约、要求再战的斗争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其声威震撼中外。时康有为有诗歌其事云:上书公车“连名三千毅相摩,联袂五里塞巷过”;纵使“九城谣谍遍网罗”,犹以“杠棺摩拳,击鼓三挝”之概诣都察院,致使卖国贼“辞位畏诟”,帝国主义者亦“惊士气则那”。书虽不达,而“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诗)。此类诗词与歌颂爱国将士的篇章一样,都令人感受到其间自有不可屈抑的民族精神在。

甲午战争诗歌中,最能突出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当属歌颂人民抗战的诗篇。编修黄绍箕等于条陈中指出:“自构兵以来,望风逃溃者,李鸿章二十余年培养之准军也,竖旗就缚者,李鸿章十年来所整理之海军也。至于百姓,忠义

之心固自在矣。”(《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二七三六]》)以辽东地区而论,日军之入侵,激起当地人民强烈反抗。日军进攻大连湾时,威逼塾师阎世开为其引路,阎世开奋笔书曰:“宁为中华断头鬼,勿为倭奴屈膝人!”遂慷慨就义。张之汉作《阎生笔歌》赞曰:“头可断,舌可抉,刃可蹈,笔可折,凛凛生气终不灭!”时日军所到,民团蜂起,辽、凤、岫等界“到处皆有团练”(《陈澧《东征要电佚存·[六四]》)。其中辽阳民团,迭挫敌锋,使敌“取奉天度岁语竟不验,其计颇穷”(《易顺鼎《盾墨拾馀·魂北魂东杂记》);东边道民团,相继收复宽甸等地,暖水以东遂“无倭人踪迹”(《东方兵事纪略·奉东篇》)。故诗人房毓琛《杂感》其十六有“山民多义勇”之赞。《马关条约》签订后,辽民“耻割地之辱,聚众七十餘团,将潜攻倭垒”(《徐庆璋《辽阳防守记》),辽阳知州徐庆璋、东三省将军裕禄长顺依克唐阿等亦请兵再战,而清廷以“和约已定”为由,传谕“即日息兵”,“不得越界生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三一五一]》)。故房毓琛《秋夜感怀》其八有“仙机一着落楸枰,馀子何堪任解征”之叹。曹润堂亦悲愤填膺,在《有感》诗中写道:“不信中原力已疲,忍将和局误师期?谁知辽海消兵日,正是军民痛哭时!”

在辽东人民遭受压抑之时,台湾人民抗战却蓬勃发展,势如燎原之火。“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黄遵宪《台湾行》》)《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绅民悲愤莫名,屡电清廷,要求废约,而终不得允准,遂推戴唐景崧主持台湾抗战,“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中东战纪本末·台民布告》)。诗人洪弃生有长诗《台湾沦陷纪哀》,叙述台湾乙未抗战极为详尽,对民众尤多讴歌。唐景崧初主台事,群情振奋,“磨戈思一战,同泽赋三良”。而基隆方陷,唐即托词脱身,致使“敌得长驱进,拉朽施利铤”。危殆之时,台民遂独撑抗日保台大业:“谁料大厦倾,乃逢一木当;香山苗栗间,义民起如蝗”;“村妇佐磨刀,耕农自裹粮”。爱国知识分子吴汤兴、徐骧、姜绍祖树帜誓师,创敌于新竹,遂使敌军“鏖战不得前,敌马徒披猖;自言海上来,未遭此颠颠”。时留台清军官兵与各地义军结成联合作战体制,转战于台中地区。高山族同胞也奋勇参战:“鸡番亦惧刀兵劫,越险争防大甲溪”(张景祁《台疆杂感》其八)。敌遂不得不“添新兵”。后刘永福先后派遣黑旗军将领吴彭年、

杨泗洪、萧三发等督率前敌诸军，与黄荣邦、林义成、简精华等部义军配合，收复云林、苗栗，并以丛林战伏击南进日军而重创之，于是“各处日军多退，云林地无敌踪，敌军大震，大队不敢行”（《台湾战纪》卷上）。洪诗云：“七月月几望，敌兵忽不扬；游骑将南进，伏甲起深篁；使之锻羽回，顿觉不翱翔”，即指此事。然而由于清廷拒绝接济，台湾军民枵腹空尊，终究“难敌百炼钢”。10月台南陷。台湾人民以简陋武器抵御日军两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面舰队的进攻，坚持抗战达四个月之久，歼敌总数比日军在朝鲜、黄海、辽东、山东伤亡之和还高出近一倍，敌酋北白川能久亲王、山根信成少将均毙命于是役。故诗人洪弃生赞道：“揭竿御坚炮，无成亦足强！”

“全局输非定，已溺有燃灰。”（丘逢甲《送颂臣之台湾》诗其六）台湾沦陷后，台湾人民的斗争并未止息。1895年12月31日，日本殖民者正准备元旦大庆贺，义军首领胡嘉猷、陈秋菊突然聚众会攻台北城，日本殖民者顿时一片慌乱。洪弃生《追述去冬时事》诗载其事云：“时十一月岁乙未，台北海山如波沸；遗民义气薄云霄，欲转汉天回汉地。骤似雄风吹雨来，复似怒潮挟沙至；重重夜袭台北城，惊杀倭兵失梦寐。城头半夜起狼烟，城外连天列象燧；倭酋持枪尽欲狂，倭卒寻刀起如醉。越日彼族元节天，不成拜贺不就次……”至明年，“台北简大狮、台南林小猫、中路柯铁虎，不约而同，各建义旗”（《台湾战纪》卷下）。其中柯铁义军以云林大坪顶为根据地，山头飘扬黄龙旗，上书光绪年号，日军屡攻不克。洪弃生《闻斗六一带被毁有感》载其事云：“闻说据在山，巉岩鬼神守；彼族佩枪登，伤仆如坠缶。”时义军遍及全台，“昼在山场夜在城，凌空蔽日如飞蝗”；“洋兵缩瑟不敢出，有如猛虎畏群羊”。（洪弃生《绿林豪》）故诗人洪弃生嘲讽日本殖民者道：“初谓一吼禁万窍，谁知满身生烂疮！”（同上）

在台湾人民抗战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除刘永福为诗坛瞩目外，诗人们还写下许多感人的诗篇，讴歌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林资修有诗赞新苗军首将吴汤兴：“草间持挺长酣战，夜里量沙独浩歌”（《诸将》其四）；连横有诗赞黑旗军将领吴彭年：“血溅草莱君不朽，胸罗经济鬼犹雄”（《送吴季篴遗骨归粤东》）；吴德功有诗赞新楚军统将杨载云：“公本血性奇男子，丹心捧日才不群”（《头份吊古诗》）；赖尚逊有诗悼中军官庄家驹：“鸟兽散馀昌古老，